



北京大学  
史学丛书



# 追寻 现代世界的足迹

董正华 著

回望东西方

聚焦现代化

史学与史家

学文献出版社  
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北京大学  
史学丛书

# 追寻现代世界的足迹

董正华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追寻现代世界的足迹 / 董正华著. -- 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0. 3

(北京大学史学丛书)

ISBN 978 - 7 - 5201 - 6319 - 4

I. ①追… II. ①董… III. ①世界史 - 研究 IV.

①K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20)第 031481 号

北京大学史学丛书

## 追寻现代世界的足迹

---

著 者 / 董正华

出 版 人 / 谢寿光

责任编辑 / 邵璐璐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历史学分社(010)59367256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83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8 字 数: 272 千字

版 次 / 2020年3月第1版 2020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201 - 6319 - 4

定 价 / 98.00 元

---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http://www.ertongbook.com)

## 《北京大学史学丛书》出版说明

《北京大学史学丛书》是2018年北京大學百廿周年校慶之際，我系在學校財政大力支持下啟動出版的一套歷史學研究叢書。與已經開始出版的《北京大學人文學科文庫·北大中國史研究叢書》、《北京大學人文學科文庫·北大世界史研究叢書》、《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叢刊》、《未名中國史叢刊》相比，《北京大學史學叢書》選題範圍更為廣泛，除新撰專著外，也包括舊作增訂、學術集刊、專題論文集、個人論文集等，旨在更加全面和充分地展示我系的學科建設成就。

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淵源於1899年京師大學堂設立的史學堂，是全国高等教育中最早建立的史學教育機構。其學術實力在全国高校歷史學院系中长期居于领先地位，在国际学术界也具有很高的声誉。近年来，随着兄弟院校历史学学科建设的不断加强，我系原有优势地位渐趋微弱，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在未来的时间里，我们将保持和发扬前辈师长的优秀学术传统，在已有基础上继续补充力量，整合队伍，拓展研究领域，明确学术标准，树立竞争意识，创造良好的学术氛围，鼓励和保护学术创新，力争产生更多的高水平学术成果，为北京大学的“双一流”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北京大学史学丛书》出版的意义，亦在于此。

本套丛书出版，得到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大力支持，谨致谢意。

北京大學歷史學系

2019年3月

**董正华** 1950年生，历史学博士，曾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北京大学人文学科特聘教授，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任；现任香港珠海学院中文系暨文史研究所教授，兼任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理事；主要著作有《透视东亚“奇迹”》、《世界现代化进程十五讲》、《走向现代的小农》，曾主编《世界现代化历程（东亚卷）》、《世界文明史》下卷、《现代化研究》（第1—3辑）等。

# 目 录

## 第一辑 回望东西方

东亚传统文化与现代变革·····	003
现代化研究在中国的兴起与发展·····	022
百年中国人权观念的嬗变·····	045
“联省共和”与荷兰的“黄金时代”·····	076
资本主义精神：从韦伯、桑巴特到托尼 ——兼评格林菲尔德的《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 ·····	090
中国人眼里的阿塔图克和现代土耳其·····	109

## 第二辑 聚焦现代化

现代化研究应当有所创新、有所超越·····	117
科学技术、生产力、现代化的本质特征与“未来景象”·····	125
以“一元多线论”为基础的“现代化范式”·····	137
东亚“奇迹”之后的再思考 ——《透视东亚“奇迹”》（合著）代前言·····	157
从多层次研究的角度重新审视东亚现代化模式 ——《世界现代化历程（东亚卷）》代前言·····	165
“发展权”与发展模式的选择·····	181

环境生态的伦理·····	187
警惕新老发展主义病毒蔓延·····	198

### 第三辑 史学与史家

历史学的困境与史学家的命运·····	205
长波理论与殖民主义史研究·····	208
菲尔德豪斯对殖民主义史的研究·····	217
罗荣渠教授和他的现代化研究·····	223
论全球史的多层级结构·····	231
观念史研究举隅	
——人权观念在中国的演变·····	240
师情友谊点滴在心头	
——怀念何芳川老师·····	246
两岸学术交流的使者	
——历史学家胡春惠先生·····	252
独把春光磨铁砚 羞将华发换闲情	
——读《罗荣渠文集》之四《北大岁月》·····	258
“世界历史”在中国	
——以“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为重点·····	267
口述史的方法和规则·····	279

---

第一辑 回望东西方

---



# 东亚传统文化与现代变革

## 一 不断重构的“东亚”

谈到东亚必先想到亚洲。“亚洲”之称来自古代希腊，最初仅指当今小亚细亚（Asia Minor）一带，以后希腊人慢慢地知道了“小亚洲”以远还有“大亚洲”（Asia Major），但也只限于当时的波斯帝国及其周围。以亚洲实际面积之大，各部分之间的差异远甚于欧洲，历史上从来不曾作为一个文化单元或者政治经济统一体而出现。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将欧亚（Eurasia）大陆细分为若干地区，但并没有形成公认的地理界限，而且地理上的划分与政治、文化区隔有很大差异。

如同“亚洲”对于亚洲人纯属晚近外来的概念，在东方古籍里也找不到“东亚”一词。“东亚”顾名思义即“亚洲东部地区”。但究竟何为“东亚”，迄今众说纷纭。日本学者子安宣邦指出，“东亚”作为一个文化地区概念，是在20世纪20年代由“帝国日本”建立起来的。“东亚”连同跟它关系紧密的“东亚共同体”，曾经是明显具有负面意义的观念。“众所周知，这个概念构成了‘东亚协（共）同体’，乃至最后扩大到‘大东亚共荣圈’的理念。”<sup>①</sup>提起“东亚协（共）同体”、“大东亚共荣圈”，深受其害者至今心里仍然留着长长的阴影。它让人想到的，不是汉字“协同”、“共存”、“共

---

<sup>①</sup> [日] 子安宣邦：《东亚论：日本现代思想批判》，赵京华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第92—93页。

荣”的本来含义，而是帝国主义的强权、霸道、侵略扩张甚至灭绝人性的烧杀抢掠。<sup>①</sup>这也像那个常常被人跟汉译佛经里表示吉祥的“卍”（万）字搞拧了的、由四个希腊字母“Γ”组成的“卐”，原本也是寓意光明、圆满，却在20世纪上半叶被纳粹玷污得不成样子。

二战结束以后，“东亚”走出日本侵略扩张的阴影，成为一个兼有地理、历史和文化内涵的流行概念，然而对其应用范围仍然众说纷纭。被尊为美国中国研究领域泰斗的费正清与他人合作，写了两部以“东亚”为书名的专著——《东亚：伟大的传统》（*East Asia: The Great Tradition*, with E. O. Reischauer,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和《东亚：近代的变革》（*East Asia: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with E. O. Reischauer and A. Craig, HUP, 1965）。书中提出，包括中国、日本、朝鲜（半岛）和越南在内的“东亚”，其概念应有三层含义：地理上指受崇岭和大漠阻隔的东部亚洲地区，人种概念指蒙古人种居住区，文化概念主要指渊源于古代中国的文明圈；结论是“可以说东亚就是‘中华文化圈’”。<sup>②</sup>师承费正清的罗兹·墨菲一版再版的《新东亚史》（*East Asia: A New History*），将东亚从其畅销的教科书《亚洲史》中一个“完整的单元”扩充为一个独立的叙述对象，而且增写了东南亚发展的新内容。墨菲也认为东亚形成了一个较易理解的文化单元。中华文明的痕迹在朝鲜、越南和日本至今仍然很明显。因此，东亚有时也被称为“中华世界”。墨菲叙述的“东亚”包括整个东北亚和东南亚，范围超出中、日、朝鲜半岛和越南。墨菲重视气候条件和农业对东亚区域文明形成的意义。强调整个东亚处于“季风亚洲”的范围之内，雨热同期，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高产农业耕地。农业是中国文明的燃料。正是在农业技术从中国传播到东亚其他地区的过程中，中国式文化被建立起来，中国人独特的土地观和人地关系观也传入这些地区。<sup>③</sup>中国学者杨军的《东亚史》从政治、经济、文化和地区、国家、区域等不同层次，探讨远古以来东亚如何成为一个独特的世界，揭示了当代东亚走向区域合作与一体化

① 参见韩东育《东亚的病理》，《读书》2005年第9期。

② [美] 费正清、赖肖尔、克雷格：《东亚文明：传统与变革》，黎鸣等译，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第1页。

③ [美] 罗兹·墨菲：《东亚史》，林震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

的趋势。<sup>①</sup>

随着经济高速增长，战后日本学界谈论“东亚共同体”的声浪再起，不排除有少数人梦想改用经济手段重建日本支配下的“大东亚”。然而也有人认为，尽管日本在经济以及文化和地理上越来越与亚洲连在一起，但她全然不是，至少大多数时候不是亚洲的。<sup>②</sup> 一说在当代日本学术界、新闻媒体和一般人的意识里，东亚大多不包括日本，而是指曾经作为半殖民地（中国）、殖民地（朝鲜、中国台湾等）和占领地（东南亚）的其他东亚国家。<sup>③</sup> 这正像罗金义先生所指出的：“东亚”一词很可能打从一开始就被“发明”为一个有浓厚意识形态指涉的“话语”。解构与重构按照西方意识形态标准“发明”出的“东亚”概念，清除其中的殖民主义遗产，比如为什么将20世纪70年代的印支半岛摒出“东亚”概念以外，等等，可以“以一本专著的篇幅来仔细论证”。<sup>④</sup>

世纪之交，随着世界经济重心由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移，频频出现经济“奇迹”的东亚，因为位于太平洋西岸而有了一个新名称——“太平洋亚洲”（Pacific Asia）。1992年美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协会”（PECC）的学者推出一本600页的大书——《太平洋世纪》，副标题为“现代太平洋亚洲的兴起”。该书着眼于美国从大西洋向太平洋的战略转移，也对太平洋亚洲即东亚如何转型为“一个‘现代的’、内部相互依赖的地区”（a “modern” interdependent world region）着力做了分析描述。作者强调，地域涵盖中、日、朝鲜半岛和整个东南亚，以及俄罗斯东西伯利亚地区的“太平洋亚洲”，虽然内部存在地理、文化和政治的多样性，但是跟南北美洲和大洋洲远隔重洋，也跟南亚和西南亚有明显的区隔，其内部联系和相互影响催生了近百年来的融合趋势和共同发展道路。<sup>⑤</sup>

以上所述几部著作，因其明白无误地以东亚为叙述对象而引起笔者注

① 杨军：《东亚史》，长春出版社，2006。

② 参见〔美〕吉姆·罗沃《亚洲的崛起》，张绍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第27页。

③ 〔日〕中村哲：《东亚近代史理论的再探讨》，陈应年等译，商务印书馆，2002，第4页。

④ 罗金义、王章伟编《奇迹背后——解构东亚现代化》，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第327—328页。

⑤ Mark Borthwick, *Pacific Century: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Pacific Asia*, Westview Press, 1992, pp. 3-8.

意。更多的著作虽然主要涉及东亚某一个时段或一部分地区的历史，但字里行间透露出著者的区域整体意识。例如，中国学者权赫秀在其讨论东北亚国家关系史的论文集里，综合分析了中、韩、日学者关于“东亚世界”的各家之说，进而指出：近代以前的东亚确曾有一个以册封体制为媒介，通用中国式农历及其纪年，以汉字、儒学、律令制度、佛教为标志的文化乃至地区共同体，近现代东亚则经历了共同体分裂与瓦解和东亚各国关联与互动的“双主题变奏”。发端于19世纪后半叶的分裂与瓦解导致各国相互疏远、隔绝乃至对立，极端的表现如日本吞并朝鲜、侵略中国终至败亡；而东亚各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日益密切的关联与互动，反映了世界一体化乃至全球化的进程和趋势。从传统东亚世界的瓦解到现代东亚世界的形成，正是东亚世界体系由逐步衰弱而重新成长为一个新的强势单位与体系的历史。<sup>①</sup>日本新生代学者川本芳昭的《中华的崩溃与扩大：魏晋南北朝》，试图以“东亚世界”的眼光解读历史，着力于中华文明的传播及其所带来的民族间复杂的互动关系。该书第十章专门讨论这一时期中华世界的扩大与“新”世界秩序，包括古代日本、朝鲜中华意识的形成。<sup>②</sup>中日韩三国共同编写委员会完成的《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以“面向未来，共同建设和平与友好的东亚新格局”为宗旨，以浅显流畅的文字介绍中日韩三国在近代走过的历程。<sup>③</sup>本书的特点是由三国学者共同撰写，所述虽非整个东亚，但对于加强各国学者的交流、树立共同的历史观，具有示范意义和推动作用。

概言之，“东亚”作为一个兼顾地理、历史和文化的概念，包括东南亚和东北亚两个部分在内。因为它位于太平洋西岸，所以又被称为“太平洋亚洲”。它的面积约1620万平方公里，占亚洲总面积的37%、全球陆地面积的12%；它的人口到20世纪末已达17亿以上，接近世界人口总数的1/3。偌大一个“东亚”，政治、经济、文化、历史情况自然十分复杂：这里历来有众

① 权赫秀：《东亚世界的裂变与近代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代前言”。

② [日]川本芳昭：《中华的崩溃与扩大：魏晋南北朝》，余晓潮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③ 《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共同编写委员会编《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多民族聚集，儒、道、佛、基督教、伊斯兰等多种文化、宗教交汇，16世纪以来又增添了近代西欧的影响。从内部看，东亚俨如一个汇聚众多民族、文化和宗教的人类博物馆，充满异质性、多样性。然而，放在世界历史的大版图上，无论从历史文化的角度，还是就其在现代经济政治发展和世界格局中的地位来看，“东亚”相对于其他区域的特性、东亚自身的一体性还是十分鲜明的。

## 二 东亚共享中华文化

古代东亚对人类文明有独特的贡献。早在人类文明发展的晨曦时代，东亚已经独立发育出了区别于南亚、西亚文化的本土文化。东亚流行的汉字以及后来的汉字变形体在世界文字史上独树一帜。到了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中国与印度、以色列、希腊等地区分别而又几乎同时发生精神的觉醒或曰文化的突破，初步形成了各具特色、富有生命力的文明形态。从那时以后，起源于黄河流域的这一支文化向东、向南、向北发展并与当地土生的文化融合，逐渐成为东亚文化的主流，形成以汉字和儒学为象征的东亚传统文明——华夏文明或称“中华文明”。历史上的朝鲜、日本、越南都曾“各自认为自身是保持中华正统的国家”。<sup>①</sup>“中华”成为华夏文明影响范围内共有的观念。中国的哲学思想、皇权官僚制度、艺术、文体、建筑乃至服饰样式都成为学习效仿的对象。因此，谈论东亚，不可能离开“华夏”、“中华”和“中国”。

“华夏”又称“中夏”、“诸夏”、“中华”，最初指黄河流域一带诸夏氏族群体、方国，跟夷、狄、蛮、戎等四方游牧部落对称，后来逐渐演变为中原王朝管辖区域的统称。“华夏”一词最早见于《尚书》。《尚书正义》解释为“冕服华章曰华，大国曰夏”。《左传·定公十年》云：“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疏曰：“夏，大也。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一也。”目前所知最早的“中国”一

<sup>①</sup> [日] 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朱荫贵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第40页。

词，见于出土文物“何尊”（青铜制成的酒器，1963年在陕西鸡贾村出土）上的周武王之子成王时的天子铭文“余其宅兹中国”，意思是“我已经据有天下之中”。以后，“中国”的内涵从京师到中原，再到泛指中原王朝，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正式作为国名则始于辛亥革命以后。但早在中古时期，只要入主中原，不管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如鲜卑人建立的北魏，对峙的宋、辽、金，大家都自认为“中国”。“南朝”虽然迁离了中原，也仍以“中国”自居。

两千年来，孔子一直被当作华夏文化或中华文化的象征。孔子定《礼》、《乐》，强调“立于礼”。儒家主张“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然后才能“明明德于天下”，个人修养和社会治理均臻于完美即“立于礼”。“礼”是儒家政治哲学的核心观念。大家都知道《礼记·礼运》里的如下一段名言：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是谓小康。

不管这段话究竟是不是孔子所说、是否掺杂了其他诸子的思想，我以为它揭示了华夏文明的真谛——正视“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所以要讲礼仪、设制度；同时憧憬曾经有过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希望回到一个“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美好社会。这些都反映了中国古人的天下观念，希望看到天下大同，没有今天区分不同民族、国家的畛域之见。同时，这段话也反映了华夏文明区别于轴心时代形成的其他几个文明的最重要特点——世俗性。

华夏所宗先秦诸子尤其儒、墨、法、道四家，在应当维护或者建设什么样的制度、如何达到理想社会等问题上曾经反复争鸣、论辩。例如，儒家主张德政、礼治，主张区别亲疏贵贱的“仁爱”；与儒家同为当时“显学”的墨家则要求打破社会等级，主张“兼爱”；法家力主严刑峻法，道家则主张道法自然、无为而治；儒家“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而法家“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儒家看到天下安宁的希望在于“大一统”而道家只要“小国寡民”，等等。但恰如后世习儒者所总结的：“周末诸子各有极致之诣……若游心能如老庄之静虚，治身能如墨翟之勤俭，齐民能如管商之严整，而又持之以不自是之心，偏者裁之，缺者补之，则诸子皆可师而不可弃也。”（曾国藩日记，咸丰十一年八月）更如何炳棣先生所指出的：《论语》、《墨子》、《庄子》等各家著述先后论及“道术”，且文意相同或者相似，都指向重实际、重功利的养民之道，亦即为解决基本民生以维持社会安定的一套方略。《庄子》所言“神人”、“神明”，都是理想中的上古圣君贤王。有证据可以说明“先秦思想中的基本关怀不是‘宇宙、人生本原’的形上探讨，而是不出生民之理、日用人伦范畴的最现实功利的‘人君南面之术’”（何炳棣：《从〈庄子·天下〉篇首解析先秦思想中的基本关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8本第一分，2007年3月）。

概言之，影响东亚两千年的先秦诸子之学，全都关注现世为人和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而绝少对“出世”即彼岸世界的探讨。对于诸子中影响最大的儒家学说，虽然早有人称之为“儒教”，例如称誉某人“世笃儒教”（蔡邕：《蔡中郎集》卷五《司空杨公碑》）、“伏膺儒教”（《晋书·宣帝纪》）、感叹“儒教沦歇”（《梁书·儒林传序》），等等，但它并非如佛教、基督教或者后世形成的道教那样的有佛祖或者上帝或者其他天神崇拜的宗教。此外还应当特别指出：从汉武帝时官家推行以经为教以儒为师起，儒学已经开始吸收其他诸子的思想，以至于逐渐变得“外儒内法”或“儒表法里”了。董仲舒在力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同时大讲阴阳五行、“天人感应”，本人的思想就有浓重的黄老刑名之学的色彩。标榜以儒家孝道治天下的汉室统治者，文景之治是为道家“清静无为”之治，武帝曾多用酷吏推行严刑峻法，宣帝则明讲“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

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汉书·元帝纪》）后世儒教，已经远非孔孟原儒了。这也反映了传统文化各种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影响、通融和渗透。

古代东亚各国深受中华文化影响，由此而形成共同享有且连绵不断的华夏文明。《新唐书》卷四十四《选举制上》“贞观十三年”条记载：“四夷、若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相继遣子弟入学，遂至八千余人。”《唐语林》卷五有“太学诸生三千员。新罗日本诸国，皆遣子入朝受业”。朝鲜半岛的新罗在唐前期统一半岛大部，与唐关系密切，淮安专设新罗馆接待新罗商人。新罗留学生为各国赴唐留学之最。新罗用汉文，中国典籍大量传入，政治、经济制度及天文、历法、艺术、服饰均仿唐，佛教亦由唐传入。日本在隋代已经开始组织人员来华，以后派出遣唐使13届，每次100—500人不等。645年“大化改新”仿唐制度，以汉字记事，9世纪根据汉字创日文字母片假名和平假名；都城奈良（平城京）完全仿长安。受日人邀请，鉴真和尚六次东渡弘扬佛法，最后终于成功。中国对日本的影响从儒道释各家哲学思想文化、语言文字、政治制度、建筑艺术延及服饰、音乐等各个方面。迨到19世纪，随着工业化、现代化浪潮从西欧一隅向世界的扩散，出现了大规模的西学东渐。如果转换一下时空，我们会看到早在一千多年以前，东亚这个局部世界曾经发生过大规模的“中学西渐”——中国文化向四方的传播。

### 三 东亚文明的开放性与包容性

然而，无论是中国还是遍及东亚的“中华文化圈”，其形成都不是单向的从中心向四周传播输出文化的结果。

首先，“华夏”无论族群还是文化，原本就有大量“四夷”元素。传说中的黄帝集团出自昆仑、崆峒，人居中原与炎族融合。周人原本居于西北，处狄、戎之间，周战胜并融合殷商，封建宗亲而成“诸夏”，此后才有了夷夏内外之别。吴、越、楚、秦长期处边远之地，起初都曾被视为蛮夷，却不妨碍她们先后进入中原称雄称霸甚至最后入主中国。刘邦先是响应张楚